

■ 魑 鸣

黄斗笠,棕蓑衣

庄户人家的雨具,全是奢侈之物,用得仔细,且使用起来还得占用一只手,拿着它,根本就无法放开手脚去干活,不是遇到赶街走亲戚,平常便很少拿出来一用。

伞,在庄户人家的眼里,只是一种纯粹好看的雨具。可蓑衣斗笠就不同了,它是雨具,但它更是人们在雨天下地干活时必不可少的农具。当然,它的主要功用还是遮风挡雨。因而,在我的老家,那时家家户主的土墙上,就时常挂有几件毛茸茸的长蓑衣和几张黄亮亮

的竹斗笠。

我说的蓑衣,全都是用棕片来制成,穿在身上不仅可以遮风挡雨,而且还结实耐用。下年里,山上的棕片割回了家,时逢家里的蓑衣也有些烂了,于是,就选上一个雨天闲眼的日子,把棕匠请进门,只需一天的工夫,就可“搥”成一件大蓑衣。

我老家的人们,总是习惯于把缝制蓑衣说成是“搥蓑衣”。我想,这或许是与棕匠们制蓑衣时,拿在手里的的那根大“搥针”有关。棕匠

一进门,总是要先选上几张上好的棕片,用一个装了无数铁钉的把将它抓成细细的棕丝,然后再搓成一段长得不能再长的细绳,最后才将棕片一一重叠地摆在地上缝制起来。有意思的是,棕匠的“搥针”,并不像缝衣服的衣针那样针眼在尾部,可以一针穿过去,再一针穿过来。“搥针”的针眼都开在针尖处,且都是一根带把的大弯针。缝制的时候,针眼穿上细棕绳,手握针把一针扎过去,只是轻轻用力再向上一翘,就又一针扎了过去。待将棕绳头送

■ 叶廷滨

蛭蛭、骨牌与蛇



我最早的自我游戏,有点像搭砌多米诺骨牌。那时,父亲在大学任职,很大的房子,很空的家,很少的人,少到经常就我自己在家。平时,我与父亲不住在一起,我上寄宿学校,周末回到母亲那里,母亲在城里的机关上班。只有放假了,才到父亲那里住一段时间。父亲所在的学校,在成都西郊的光华村。上世纪50年代初,就是建立在乡间田野里的一所大学,连学校的围墙都是竹篱笆。大部分的校舍都是平房,最初还有不少草舍,到了1956年,才变成了青瓦盖顶。

1957年夏天,我到父亲那里度假,就像下乡,住两层的小楼,一出门,完全是乡村景象。父亲身边一直配有警卫员,给大学校长配警卫,可见天下大定不久。警卫员姓张,叫张余祖,后两年又改叫通讯员。下班没事了,就带着我们捉蛭蛭、抓知了。那时的蛭蛭真多,一早出去能抓几十只回来,把蛭蛭放在玻璃窗和纱窗之间,那是最好的蛭蛭笼。蛭蛭爱叫,晚上一起叫起来,能压过外面的蛤蟆声浪。我就在窗户上挂一个小棍,一头捆上绳,绳的一头引到床头。晚上睡觉,被蛭蛭的百家争鸣吵醒了,拉一下绳头,咚地敲响了窗框,霎时万马齐喑,继续睡太平觉。

在乡下度假,鸟啼蝉鸣,风清气爽,常常睡得是日上三竿不觉晓。醒来,恨那大好时光昏昏然过去,不甘心。于是便在闹钟上下工夫,不仅要响有声,还要有动静。那时闹钟都是机械型,小铁锤当当地敲钟上的小铃,叫“双铃马蹄闹钟”。在闹钟小锤上系一根丝线,线的另一头摆着一排骨牌,骨牌的另一头,放个皮球。铃声一响起,丝线一抖动,骨牌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第一张骨牌先是被动挨打,然后去打击下一张骨牌,传递着力量和不安,最后一张骨牌把力量传给皮球,滚动的球最后

砸在脑门上,起床了!这是孩子的游戏,我从这个游戏中发现我的智慧,我觉得我能当物理学家。那阵子,我爱读苏联版的《十万个为什么》。

张余祖这个通讯员的名字能让我记住,实在是个奇怪的事。许多更熟的同学、同事或朋友的名字,我都忘了。他只是和我度过了两个假期,竟然烙印一样忘不了。因为他会捕蛇!晚上他带我出去散步,手里总是提着细竹棍,专门用来打草惊蛇。他说不小心踩上草丛里的蛇,会有危险。有一回,草丛中惊了的蛇,不逃走,反而向张余祖扑过去。说时迟那时快,他手一挥,捏住了蛇的七寸,将那青蛇捉起来,一扬臂远远地丢到小溪那头去。后来,他告诉我,他父亲是卖跌打刀枪药的那中,专门抓蛇、蝎、蜈蚣等毒虫制药。他从小就抓这些虫豸,习惯了。

这本来是件不大的事,但对一个小孩来说,印象深刻。能记住他的名字,还在于这个夏天不平常。那时,在校园里散步,看见教室里常发生激烈的争论,争得白热化了,就会有人被架到讲台上,低头听别人的呵斥。后来才知道,是学校在搞“反右”斗争了。多年来,一说到“反右”,常有那句“引蛇出洞”,于是,我就想起那个郊外乡下的晚上,那个能抓蛇的张余祖,那个他爹教给他的打草惊蛇的“夜行人”路线。

那个夏天,在我的记忆中,有两点真值得反思:一是我小小年纪,怎么就想到把所有的蛭蛭关进纱窗里呢?一面是玻璃窗,让蛭蛭们感到风景如画前途光明,另一面是纱窗,让它们空气清新自由呼吸,一旦蛭蛭们放声歌唱自由争鸣,我又给它们敲一棒子!二是我小小年纪,怎么也会玩骨牌游戏?看“令如山倒”,一倒都倒,被人打击者,再去打击别人,谁都是链条中的传递者,这不是在建造一种“机制”吗?

那个夏天过后,我再也没去这所郊外大学的校园里度假了。第二年,我的母亲从省城下放放到偏僻的大凉山“锻炼改造”,一年后,留在了当地师范学院当一名语文老师。母亲回不了省城,我也坐了三天的长途客车,去了大凉山,和母亲做伴,在大山深处开始了底层少年的生活。

我童年生活最后一个夏天的记忆:蛭蛭,骨牌和一条草丛里的蛇。

篆刻 张天龙



小时候,人们把玩具当成朋友;长大了,有些人把朋友当成玩具。 漫画/赵春青

(一)

2009年冬日的一个下午,北京西苑医院住院部的病房里。黄德容老人躺在病床上,一头银发,白色被褥映衬下,苍老的脸庞红红的。护士说,老人血压高,还有点低烧。

看见我们进来,老人挣扎着要起来坐,并用正在输液的手示意我们坐下。

看着老人迟疑的目光,老人的小女婿吴先生大声提醒她,说:“妈,陕西来人看您了,陕西,是陕西,知道吗?”

老人抬起头,端详了一会儿,漠然地摇了摇头。

吴先生笑了,说:“他们是延安来的……”说到延安,老人的眼睛忽然一亮,咧着没有牙的嘴就笑了,“延安来的啊,什么时候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刚才没想起来。谢谢,谢谢,这么远的路,你们还来看……”

我们说是开会,顺路来的。

老人说:“前年去延安,给你们添麻烦了。代我向延安的同志们问好……”

(二)

黄德容出身于广州一户富裕人家。1938年7月,她带着妹妹黄德媛和另外两个同学,满怀抗日救国的革命激情,在广州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黄德容、黄德媛是双胞胎,这对形神酷似、花一样的姐妹,当时只有18岁。姐姐刚刚高中毕业,妹妹黄德媛大学一年级。抗日的烽火,爱国的热情,对革命的向往,促使她们抛弃了舒适的生活和优越的环境,投奔革命。

从西安到延安的路很远,交通极不方便,没有车,几乎全靠步行,脚底走得打了血泡,累得一停下站在那儿就能睡着,她们马不停蹄地走了整整7天才到了自己县陕北公学校分校。在陕北公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学习,1939年初她们又步行到了陕北的保安县(今志丹县)。在保安还未坐定就接到上级命令,急行军3天,步行200多里地赶到延安的西川口军委三局通信学校参加学习。这次学习的时间比较长,学习毕业后已经是1940年

资讯快速
“ 新中国60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 ”在京颁奖
本报讯 2009年12月23日,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举办的“新中国60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颁奖。《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哥德巴赫猜想》、《扬眉剑出鞘》、《胡杨泪》、《强国梦》、《天使在作战》和《木棉花开》等30部作品获奖。
此次评选出的作品囊括了60年来不同历史时期报告各种重大社会问题和事

“的士才艺秀”闪亮登场

本报讯 唱歌、跳舞、说相声、画国画……2009年12月29日,北方出租大院内格外热闹,一个全部由出租司机组成的“北方的士艺术团”在北京成立。该团是北京市第一家由“的哥的姐”组成的艺术团。的哥的姐们每天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年复一年。为了让他们的天空多一份精彩,在北方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领导的努力下,“的士才艺秀”闪亮登场。

了过去,针就又抽回来。如此往复,直至将一整件蓑衣“搥”完。

因要挡雨,那些蓑衣时常就做得十分宽大,及至肩膀处,不仅要反转过来盖住整个肩头,而且还要向外伸展得更开。这样的蓑衣穿戴在身上,远远望去,简直就像古代武士披挂在身上的大铠甲。因而,在山里,穿着蓑衣来玩打仗,就成为贪玩的孩子乐此不疲的一种经典游戏。

蓑衣再怎么宽大,毕竟只能护着人们的后背和肩膀,可脑壳最终还得要靠斗笠来护着。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最原始的斗笠,还是那种用两层竹网、中间夹上片片察竹叶的察叶斗笠,不仅样子粗糙丑陋,戴在头上还时常“霍霍”直响,稍不留神,就会挂出一个大窟窿。后来,人们又尝试着在编好的斗笠竹网上糊上绵纸,刷上桐油。这样的斗笠好看倒是好看多了,可依旧还是一戳就破。再后来,人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更好的斗笠制作方式。那就是像编蔑席蓑箕一样

地来编制斗笠,里面加上帽框,然后再来刷上桐油。这样的斗笠,看起来不但美观大方,而且还扎实耐用。雨天不干活的时候,顽皮的小孩子戴着去上学,放学的路上,站在高■上,相互比赛旋转着斗笠“放风筝”,是一点都不会被摔坏。

其实,蓑衣和斗笠,除了平时雨天里,人们穿戴着到菜园里去掐把菜、到地里巡田开开田口子,或是到山上为老牛割捆嫩草外,更多的还是用以去栽苕。

山里的坡地总是有很多,因而,红苕的种植面积就很大。种苕,得趁着天晴,先在地里打上一垄一垄的苕行子,单等下雨了,地里有足够的墒情,再来冒雨将种苕田里的苕秧子割下,剪成一截一截,一根一根地往地里插上,栽苕是一个在雨天地里弯腰劳作的活,缺少了蓑衣斗笠,是什么都干不了。

可栽苕又是一件很有趣的农活。天上在不停地地下着雨,人们挽着裤腿,披挂着蓑衣斗笠,手里还握着一把形如手枪的“苕锥子”。撒

苕秧子的顺着苕行子在前面一路撒过去,栽苕的就在后面一路栽过来,看准了苕行子,先一锥子下去,抽出,插上一根苕秧子,再斜插一锥子扳过来,苕秧子立马就被压了个结实。未了,再顺手用苕锥子在苕行子上猛地一敲,斜插的洞口就一下又得到了闭合。那些种田的老把式们,弯着腰,时常做得又快又好,干得很是干净利落。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街上时兴卖起了塑料雨衣。有了塑料雨衣,蓑衣斗笠再用烂了,便也懒得去管。再后来,栽苕的方式也慢慢地被压苕所取代。只要地里还有着墒情,掏出一条沟来,放上苕秧子,返土压上就算成,大晴天里照样也可以干。于是,蓑衣斗笠也就在人们对新事物的不断好奇中,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被束之高阁,落满了灰尘。直到近年来有一天,一个兴办民俗旅游的老板进山来,高价收购这些已被人们淡忘的旧物,人们才猛然记起,自家的阁楼里,也还有着几件这样的蓑衣和斗笠哩!

■ 杨建国

小屋

夜里千百次的梦语,风中万千次的眺望,在灵魂中只剩下一个躯壳。如风中的一只小鸟,飞过了万千之年。

多少年前,这里曾发生了多少个故事,多少年后,却深深地埋藏了一支久远的小调。它默默地承受着风霜雨雪的煎熬,扯长了飘摇的绿叶,一如长风在默默的原野中走过,走过谁也不知道的春秋。

岁月与寒冷,总是围起你的孤独与忧郁,圆圆的月亮每晚总是把它的清辉洒于你的脸颊,伴着你流下湿湿的泪花。

亘古不变的冀盼,孕育着血一样的刚毅。镀着残阳般的印记,小屋之前,有股清清的漂流汨汨地诉说着远去的故事。

多少崇敬的心海里,深深地烙下了那一方烙印,裹挟着凋零的羽片和奢望,踏起滚滚的风云,在另一个世界里,雕塑着一个崭新的憧憬。小屋前,那枝绿柳还飘着零散的思念。

呆呆的时光里,一壶浓浓的茶醉了漂离故乡的甜梦。音乐声里,小浓的故事悠悠地飘离而去。小屋前的那棵柳树还能拴着一颗悠悠的心吗?

故乡的小屋里,时至今日,是否仍在哑口无言地伫立着一尊远去的风景?

■ 周养俊

那魂牵梦绕的地方

(四)

的春天了,姐姐被分配到新华广播电台做广播机的技术设备维护工作,妹妹则被分配到了《解放日报》社……

(三)

黄德容老人想念延安,逢年过节一家人团聚时,她就叨叨着要回延安看看。

2007年秋天的早晨,黄德容老人手扶拐杖终于站在了延安北郊王皮洼的山坡上。望着遍地的荆棘、荒草,望着盛开着的山丹丹,望着缓缓流动的小河,望着这几孔熟悉而又陌生的窑洞,她想起了那沉落的太阳,那血红浸染的枯柳的倒影,那河水绕着的小村庄。

王皮洼,这个早已被世人遗忘了的名字,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却是一处非常神秘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中央广播电台就设在这条不起眼的小山沟里,广播电台使用的第一部广播机是周恩来副主席从数千里之外的苏联带回来的。

在这里,他们把党中央的声音一次次传遍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把地下党的情报一个个人传送给中央首长。工作虽然平凡单调,任务却光荣而艰巨。

不久,组织再次选派她参加通信学校的学习,在这里,黄德容认识了一位叫柯平的青年。这个青年原是山西牺盟会决死队的队员,在一次战斗中因受伤被阎锡山的部队逮捕,年轻人凭借着机智勇敢,趁哨兵换岗之际逃离了虎口,一路风餐露宿直奔延安参加了革命。两个年轻人志同道合、兴趣相投,很快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由于敌人的围剿,黄德容和她的战友们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掩埋了广播机及其设备,跨过黄河转战山西。西安解放后她随部队到了陕西,一直在19兵团工作。丈夫柯平出任陕西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后,她转业到地方,在西安邮电学校任部门领导。1953年,她的小女儿柯苏力刚出生一个月,又同丈夫一起匆匆赶到北京任职。

老人不能忘记延安的岁月,不能忘记王皮洼的机房,不能忘记瓦窑堡敌机的轰炸,不能忘记延安撤离时的艰苦,不能忘记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时的情景。

(肖一)

第五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揭晓

本报讯 2009年12月22日,第五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揭晓。《科学的旅程》、《风雨雨而一百年》、《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简明新全球史》、《风化成诗——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吴冠中画作诞生记》、《小趋势：决定未来大变革的潜藏力量》、《亲爱的安德烈》、《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

张大力图像史研究个展在京举办

本报讯 2009年12月12日,由北京圣之空间艺术中心、广东美术馆主办的“第二历史——张大力图像史研究个展”在北京展出。

本次展览展出的130件作品、图像,时间从上个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跨度达半个多世纪,展示了张大力用近5年的时间整理完成的图像史对比研究。展览通过系统调查历史照片的修改和所使用的方法,以纯档案的形式,从艺术的角度,探索修改过的历史照片效果背后所构成的“第二历史”,反思中国

现代视觉文化的机制,以及人们的主观意志和喜好对现实世界直观影像呈现的影响,引导人们重新思索理想化在群众文化和大众心理中的普及。

张大力,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以街头涂鸦“大头人”——系列作品“对话”而闻名,曾创作《肉皮冻民工》、《一百个中国人》、《风·马·旗》等作品,并多次在中国、意大利、英国、日本、美国、法国等地举办个展或展出作品。(文艺)

■ 柳 哲

从沙滩“红楼”看北大精神

见证了北大百年悲喜沉浮历史的沙滩“红楼”,虽经岁月的风吹雨打,如今仍巍然屹立,并得到精心维修保护,焕然一新,实在令人欣慰。

北大“红楼”的重修竣工,使我不禁想起那些已经逝去的北大的人和事,也让我重温了一次北大“红楼”所孕育的北大精神。

北大精神是什么?这个问题,真是很难说清楚。我想以北大校长蔡元培作为切入点,试着来谈谈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

蔡元培从1917年1月4日正式出任北大校长,至1927年出任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离开北大,前后正好是10年。

蔡元培校长所提倡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似乎成了北大不是校训的校训。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几乎影响了近一个世纪。

蔡元培主校北大时,旁听与“偷听”之风盛行。当时有“五公开”:课堂公开,图书馆公开、浴室公开、运动场地公开、食堂公开。

北大老校友朱海涛先生,60多年前就在《东方》杂志撰文《北大与北大入》,深情追忆了不少老北大的人和事。

他说:“读书,则是窗明几净的北大图书馆,不论你是不是北大学生,都将你当做北大学生似的欢迎你进去。”

“最痛快的是求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北大无愧于‘国立’两个字。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绝不会有人来查问你,更不会市偿似的来向你要几块钱一个学分的旁听费。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着博大的风度,绝不小家子气地查盘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因此,你不但可以听,还可以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拿长篇论文来请他指正,他一定很实在地带回去,很认真地看一遍(也许还不止一遍),下一堂课带来还你,